

<<东坡志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东坡志林>>

13位ISBN编号：9787101058482

10位ISBN编号：7101058485

出版时间：2007-9

出版时间：中华书局

作者：(宋)苏轼

页数：267

译者：刘文忠 评注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东坡志林>>

前言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家，诗、文、词、赋都有很高的成就，一生著述甚多。

嘉元(1056)，二十岁的苏轼与弟苏澈一起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同榜中了进士，不仅深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而且也得到当朝皇帝宋仁宗的称赞，“仁宗以制科得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宋史·后妃传上》）

嘉元六年(1061)，苏轼开始步入仕途，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在凤翔刚满一任，其父苏洵病死京师，轼扶丧归里，丁父忧后，于熙宁二年(1069)还朝，这时正值王安石执政为相，安石平素恶其议论异己。

仅给了他一个告院判官的官职。

过了二年，王安石的新法得到神宗的支持，并迅速向全国推行，苏轼连续上书反对变法。

由于意见未被采纳，又激怒了王安石，苏轼自感难以见容于新派，遂请求外放，通判杭州。

此后又徙知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了十年左右的地方官。

在任职期间，苏轼能关心人民的疾苦，重视农田水利及水、旱、蝗灾的救灾工作，特别是熙宁二年(1077)移知徐州时，黄河决口，大水汇于城下，又加大雨日夜不止，城墙未被淹没的部分仅三板厚，“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

”（《宋史·苏轼传》）可以说在此次抗洪抢险中，苏轼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这时王安石已经两次罢相，彻底退出朝廷。

苏轼虽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外放，安石罢相后，他不但未得到丝毫重用，一场更大的灾难反而落到苏轼头上。

元丰二年(1079)他刚徙知湖州不久，便被逮捕，原来是新进派官僚何正臣、舒宣、李定等，在苏轼诗文中找茬口，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包藏祸心”，把苏轼投进监狱，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经过几个月的折磨，幸赖曹太皇太后亲自向神宗求情（见《宋史·后妃传上》），苏轼才幸免于死，责贬黄州，为团练副使。

被贬黄州的四年中，他躬耕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元丰七年(1084)，改贬汝州，离黄州北上的途中，苏轼上书自言饥寒，有田在常州，愿居常州。

诏准，逐过金陵，会见了与他政见不合但私交尚可的王安石。

苏轼至常州后，神宗去世，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朝廷启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刚徙知登州，便被召回京，任礼部郎中，不久，迁起居舍人、中书舍人。

次年(元祐二年)，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元祐三年(1088)，权知礼部贡举。

这时苏轼与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又产生了矛盾，他不同意旧党尽变新法，不同意废免役法，由此引起旧党对他的猜疑。

司马光死后，旧党发生分化，苏轼遭到忌恨，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

元祐四年(1089)，苏轼第二次到了杭州，在杭州近三年，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杭州市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宋史》本传），足见他赢得了人民的爱戴。

元祐六年(1091)苏轼又被召回京，原拟任礼部尚书，以弟苏辙除右丞，改翰林承旨。

苏轼在翰林院数月，又以受谗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

次年，徙知扬州。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时局又发生变化，一些投机新法的分子如章惇、吕惠卿、曾布、蔡京之流，以绍述熙宁、元丰新政为名，尽复高太后临朝时所废新法，大肆迫害元祐旧臣。

这时苏轼正任礼部尚书，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知制诰。

苏轼已感到形势对他不利，又请求外放，以两学士出知定州。

然而苏轼外放并没躲过一场灾难。

绍圣初(1094)御史论轼知制诰时所作制诰，有“讥刺先朝”之处，以此罪名贬知英州(今广东英惠)

<<东坡志林>>

，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又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一月之内三次贬职。

如此一贬再贬，当权者犹不解恨。

绍圣四年(1098)四月，又把苏轼贬至海南的儋州(任州别驾)，苏轼此时已经六十岁了，他只得只身携幼子苏过，浮海南渡，垂老投荒，北归无望，真正是“海南万里真我乡”了。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病故，其弟端王赵佶即位，是为徽宗。

徽宗即位后，宽赦元旧臣，苏轼遂奉石内迁。

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苏轼过大庾岭，四月经庐山，五月至金陵，闻朝内又有排挤元旧臣迹象，遂决计定居常州，六月海倒在由金陵去常州的船上，七月二十八日，六十六岁的苏轼不幸溘然长逝。

《东坡志林》所载各篇，相当一部分留下了写作年代，较早的是元丰年间，较晚的是元符四年，前后历二十余年，大体上是从被贬黄州始，至元符四年遇赦内徙止，共二百零三篇，内容相当丰富，正像万历二十三年(1595)赵用贤《刻东坡先生志林小序》所言：“皆纪元(当为元丰)、绍圣二十年中所身历事，其间或名臣勋业，或治朝政教，或地理方域，或梦幻幽怪，或神仙伎术，片语单词，谐谑纵浪，无不毕具。

而其生平迁谪流离之苦，颠危困厄之状，亦既略备。

然而襟期寥廓，风流辉映，虽当群口见嫉、投荒濒死之日，而洒然有以自适其适，固有不为形骸彼我，宛宛然就拘束者矣。

综观《东坡志林》，我们可以窥见东坡的学养、思想、世界观的诸多方面，东坡是位于学无所不窥的大学问家，他对于经学、史学巧至诸子百家都很有研究，而且特别重视经世致用和以史为鉴，尽管他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有些是片面的、不足取的，但可以看出他的用心是古为今用，是欲垂戒于后世。

苏轼不是纯儒，他对儒、道、释三家颇能兼融贯通，关于这一点不仅在《志林》中的“佛教”、“道释”类中各篇可以看到，在“修养”与“异事”类中亦可以看到。

他的佛学修养很深，与众多的和尚、道士交往密切，又读过不少佛经，对佛典之熟悉，如数家珍，但他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的谈佛论道，有时近于戏谑。

如卷一的《论修养帖寄子由》篇，即可看到此点。

《志林》涉及道家者，主要不是道家的哲学观点，而是道家的养生、导引、炼丹、辟谷等。

苏轼对《易经》颇有研究，他不仅有《东坡易传》九卷传世，而且精通占卜，卷三之《记筮卦》，是用《周易》为其弟子由占卜的，他自以为“考此卦极精详”，昔口传授给小儿苏过，又“书而藏之”。

苏轼有点迷信，且相信命运。

“命分”类的三篇，可见其一斑。

他认为“人生自有定分”，韩愈以磨蝎星为身宫，他自己以磨蝎为命，所以“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

又说友人马梦得与他同年同月而生，生日比他晚八天，“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

东坡又颇通医术，《修养》、《疾病》、《技术》三类，不乏此类记载，从《志林》一书可以看出，苏轼是一位杂家。

苏轼的思想比较活跃，也比较解放，他的思想虽以儒家为主，但儒家经典并不能拘束化，评价历史人物，议论古人古事，多所创见，发前人之所未发。

如卷五之《武王非圣人》，提出武王伐纣是以臣弑君，并连及汤之伐桀，认为如当时有良史董狐，必以叛、弑书。

对孟子所言“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苏轼指出这是乱了孔子的家法。

在封建时代，“薄汤、武而非周、孔”往往成为名教之罪人，苏轼公然指责汤、武之篡弑，这是非常大胆的。

在《摄主》篇中，苏轼强烈反对母后临朝摄政，他举出许多例证说明因母后摄政而使国家乱亡以至江山易姓的事实。

<<东坡志林>>

其实这个问题在宋代是较为敏感的，北宋出现四次母后临朝听政，除苏轼提到的曹、高、向三皇后、皇太后外，就在他遇赦的元符四年徽宗刚即位时，也是皇太后临朝，他虽然说宋代几位临朝的皇后，都是千中挑一的好皇后，但他的前提却是反对太后于政，为此，他引用了孔子“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这是相当有刺激性的话，也很容易被 人抓住把柄罗织罪名。他数次获祸，与此是有关系的，其个性可以说至晚年一点未改。

《志林》一书，可略见东坡鲜明的个性，他是一位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人。

卷一之《滂沙湖》，写于被贬黄州时期，当他下临兰溪，看到溪水西流时，高唱一首充满豪情的歌：“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

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其精神真是难能可贵。

卷二《书杨朴事》，叙述了隐士杨朴的故事，杨朴以能作诗被召进京，及召对时，自言不能作诗，皇上问他：“临行有人作诗送卿否？”

”杨朴回答说：“惟臣妾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上大笑着，放还山。

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于湖州，妻子送出门，自觉无生还希望，皆哭。

轼却回头对妻子说：“独不吨如杨子云(实即杨朴)处士妻作诗送我乎？”

”妻子不觉失笑。

在皂死关头，苏轼尚能如此旷达，又如此诙谐，这是常人所不能做到的。

卷一的《措大吃饭》、《题李岩老》，读之让人捧腹大笑，可入《笑林》。

众所周知，苏轼是反对王安石的变法的，他为何反对新法，晚年对新法的看法有无改变，我们可以在《志林》中找到答案。

苏轼对法家人物，对严法峻刑，对革新派，可以说都没有好感，而且不时地对他们进行口诛笔伐。

卷五《司马迁二弋罪》，把司马迁论商鞅变法之功及汉代桑弘羊设平准法、实行盐铁国有，使“民不加赋而上用足”的功劳，目为战国游士的邪说诡论。

司马迁颂扬二人之功，是司马迁的二大罪过。

卷四之《王嘉轻减法律见梁统传》，言梁统上书说“高、惠、文、景以重法兴，哀、平以轻法衰”，请增重刑法即用严法峻刑治国。

苏轼说梁统“一出此言，遂获罪于天”，梁统的两个儿子皆死于非命，至孙子辈梁冀梁家秽灭族，这都是梁统造下的孽，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在卷四之《柳宗元敢为诞妄》中，批判柳宗元极力称赞吕温、吕恭兄弟(王叔文革新集团的成员)是诞妄，并把柳宗元与王、王叔文交友，视为与恶名昭著的裴延龄联姻一样的耻辱等等，可见苏轼的固执与偏见，是不可讳言的。

卷二的《唐村老人言》，写于元符三年被贬海南时，篇中叙述了一位老农对“青苗法”和均贫富的评论，这位老友认为：贫富之不齐，是天经地义的，“民之有贫富，由器用之有厚薄也”。

如“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动，而薄者先穴矣”。

苏轼称赞这位“负薪”者“能谈王道”，可见他对王安石新法的看法至晚年也未改变。

有些研究者指出：“元丰七年，苏轼改贬汝州，离黄州北上时，路过金陵，曾拜会退休宰相王安石，两人政治见解虽有分歧，但依然保持了良好的私交。

他们共游蒋山，互相唱和，翰墨友谊又有了发展。

”这虽然是有据的，但也不过是表面的应酬而已，苏轼对王安石的看法，至晚年也并无改变。

卷二之《记盛度诤词》中，苏轼提到“论周擅议宗庙”事，为了注释的需要，笔者从苏轼的《奏议集》中，查到了《论周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二首，看了之后不免有点吃惊，周擅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原为江宁府右司理参军，经苏轼举荐，做了郢州的州学教授，在王安石死后，他曾上表请求将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

苏轼自劾札子云：“谨按汉纪，擅议宗庙者弃市。

<<东坡志林>>

……窃以为安石平生所为，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难逃圣鉴，先帝盖亦知之，故置之闲散，终不复用。今已改青苗等法而废退安石党人吕惠卿、李定之徒，……而先帝配享已定用富弼，天下翕然以为至当。

复何人，敢建此议，……谨自劾以待罪。

”从苏轼对王安石的评价看，是带有个人成见的，虽曰自劾，但“擅议宗庙者弃市”一句，未免令人毛骨悚然，由此我们不能不怀疑王、苏之间的“翰墨友谊”了。

《志林》中有些文献资料弥足珍贵。

卷一之《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说明北宋时民间艺人所说的“三国语”已带有尊刘抑曹的正统倾向，常为文学史家所引用。

卷四的《筒井用水鞴法》，是北宋重要的科技史料，其他各篇，可史料价值的亦不在少数。

记述人物故实的篇章，亦有足资参考考。

《志林》各篇，虽大多篇幅短小，但由于作者是大手笔，往往随手挥洒，涉笔成趣，实为晚明小品之滥觞，其影响是较大的。

迄今为止，笔者还未看到《东坡志林》的注本。

我所用的白文底本，是1919年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校印本，它的母本是明万历乙未的赵刻本，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王松龄校点本，亦是以涵芬楼校印本为底本，我吸收了王松龄先生的不少校刊成果，在此对他表示感谢。

由于注释的需要，笔者标出了部分《志林》中涉及的人物、事件的出处，为读者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发现了苏东坡的一些张冠李戴的误记。

以笔者的知识结构，深感注《东坡志林》的困难，缺点和错误定然存在，恳切欢迎海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刘文忠 2007年4月

<<东坡志林>>

内容概要

《东坡志林》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家苏轼历时二十余年撰写的，共二百零三篇，内容丰富，从中可以窥见他的学养、思想、世界观等诸多方面，尤其展示了他的鲜明个性。

<<东坡志林>>

作者简介

作者:(宋)苏轼

<<东坡志林>>

书籍目录

编选说明东坡志林卷一 记游 记过合浦 逸人游浙东 记承天夜游 游沙湖 记游松江 游白水书付过 记游庐山 记游松风亭 儋耳夜书 忆王子立 黎稼子 记刘原父语 怀古 广武叹 涂巷小儿听说 三国语 修养 养生说 论雨井水 论修养帖寄子由 导引语 录赵贫子语 养生难在去欲 阳丹诀 阴丹诀 乐天烧丹 赠张鹗 记三养 谢鲁元翰寄暖肚饼 辟谷说 记服绢 记养黄中 疾病 子瞻患赤眼 治眼齿 庞安常耳聩 梦寐 记梦参寥茶诗 记梦赋诗 记子由梦 记子由梦塔一 梦中作祭春牛文 梦中论左传 梦中作靴铭 记梦 梦南轩 措大吃饭 题李岩老 学问 记六一语.....东坡志林卷二东坡志林卷三东坡志林卷四东坡志林卷五

<<东坡志林>>

章节摘录

插图

<<东坡志林>>

编辑推荐

《东坡志林》中有些文献资料弥足珍贵。

卷一之《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说明北宋时民间艺人所说的"三国语"已带有尊刘抑曹的正统倾向，常为文学史家所引用。

卷四的《筒井用水鞴》，是北宋重要的科技史料，其他各篇有史料价值的亦不在少数。

记述人物故实的篇章，亦有足资参考者。

《东坡志林》各篇，虽大多篇幅短小，但由于作者是大手笔，往往随手挥洒，涉笔成趣，实为晚明小品之滥觞，其影响是较大的。

<<东坡志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